

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紀念文集

中山圖書館

廣東 廣州

紀念定友先生逝世廿周年
 先生生前在廣州創辦南師而歸
 說其學業華新引道各人心之官
 厚福小可祝其國惠民却子利
 概其芳名今懷昔九泉含笑大
 年

鍾亞新謹誌

劉子欽奉

《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誌念》

華南農業大學·梁家勉敬撰

殫結圖書歲月深
 校離功力世同欽
 術融中外超羣鄭
 學有淵源溯向欽
 弘道未因烽火輟
 誨人不避病貧侵
 名垂千古光東壁
 桃李芳菲遍綠陰

筆耕墨耘辛芳無恙嶺南

文人氣質猶存

紀念杜定友先生逝世
二十週年

學者風骨還在

武漢大學 謝幼辛

勵志圖新甘苦有知粵東

緬懷杜定友先生

廖衍沅

春殘朝暮看飛花，
綠竹扶疏立不斜。
何必營營爭顯赫，
惟求切切忘無賒。
书城一老差堪擬，（注）
教澤千秋信可嘉。
盛世欣逢功在在，
康莊前路漫紅霞。

（注）杜老《讀杜詩》有句云：“余性守窮約，
生涯甘寂寞，坐擁書百城，自謂南面樂。
……”。

（華南師範大學）

目 次

题词 (四幅)

题词 (四幅)

- 1、奋斗经半个世纪 育才称一代师表
——为纪念杜定友先生逝世廿周年而作
南京图书馆 钱亚新…… 1
- 2、学习《杜定友先生》遗稿的心得体会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王可权…… 6
- 3、他有一颗晶莹闪亮的事业心
——写在杜定友先生逝世廿周年
中山图书馆 赵 平…… 10
- 4、事业是世代相承的
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 赵世良…… 13
- 5、领异标新的开拓者
——学习杜定友先生的治学精神
湖南农学院 陈士宗…… 15
- 6、与杜先生交往的回忆
中南工业学院 周 杰…… 19
- 7、高尚的思想情操 职业道德的楷模
——纪念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
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 俞从周…… 21
- 8、一代学人的奋斗之路
——纪念杜定友先生
武汉大学 谢灼华…… 24
- 9、渊博的学者 热忱的导师
——回忆敬爱的杜定友先生
南京大学 倪 波…… 31
- 10、忆杜老
中山大学 刘少雄…… 33
- 11、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安徽大学 桑良知…… 34
- 12、一曲悠扬的牧歌
读《治书生活》《著书生活》
广东省文化厅图书馆处 刘 毅…… 38
- 13、回忆杜定友先生二三事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叶协力…… 43
- 14、怀念杜定友先生
中山图书馆 张望自…… 44
- 15、杜师为人二三事
中山图书馆 朱镇海…… 45

附：杜定友著作目录 1916——1966 张世泰编…… 1—29

奋斗经半个世纪，育才称一代师表

——为纪念杜定友先生逝世廿周年而作

钱亚新

杜定友先生（1898—1967年）广东南海人，生于上海一个个体户经营照相业的家庭之中。他八岁入私塾（1905），十一岁进学堂读书，十七岁毕业于上海专门工业学校（南洋公学前身，后改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在小学读书期间，虽参加家庭经营照相业技术上的劳动，但学习勤奋，成绩优良，获得奖状，因而升入该校的附属中学。在这四年中，他爱好体育，喜欢活动，尤能撰文投稿，以稿费订阅报刊。又长于英语，发起组织英语学会。从1916年到1919年间，曾发表14篇文章，其中6篇是以英文写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体育和童子军方面的论述。二十一岁中学毕业，仍以成绩优良而获奖。是年5月，母校筹建新馆，为未雨绸缪而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特保送他往菲律宾大学，攻读图书馆学。

杜先生在菲律宾学习期间，除认真攻读必修科和选修科外，先后做了不少事情。如曾担任当地《民号报》的编辑；组织了中国留菲学生会，并担任会长；组织学生救国会焚烧日货；办理华侨赈灾会救济中国水灾灾民等社会活动。为要深入了解中菲邦交和在菲华侨的动向，他曾担任我国驻马尼拉领事馆领事私人秘书，由于留学津贴费有限，还要抽出时间写文章，发表了31篇，收入了一些稿酬以补津贴的不足。因此，在菲留学三年就成为一位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

杜先生多次提到在菲留学影响极大的一位老师 Miss Mary Pork。她是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兼国家科学局图书馆馆长，已经从事图书馆事业四十多年。对他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要求严格，言传身教，处事认真，一丝不苟，以终生为图书馆教育和事业付出全部精力。先生十分钦佩，因此每每谈及，就以此而勉励他自己的学生和同事。1921年5月离菲回国，但在1920年已被菲大授予文学士学位；毕业那年，又授予教育学学士、图书馆学学士，一举而得三个学位，就可想而知先生的敏慧用功，并非一般人可比拟的。

杜先生自从留学回国以后，就以他所学到的学问、本领开展几方面的活动。在教育，尤其图书馆教育方面，起初在广州市民大学担任义务教授，讲演“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明日之教育”的演讲。其后被聘任创办广州市师范学校并任校长，首先提倡男女同校，且在师范学校内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同时还兼任市民大学教授，并以讲稿整理成为《图书馆与市民教育》一书出版。那时不仅他办校声誉很好，而且又受聘为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图书仪器事务委员。他就借这个机会大搞图书馆工作，办起教育委员会的图书馆。不久，又兼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大加整顿，气象更新，撤销了董事制。1922年3月先生在广州创办广东省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由广东教育委员会通令省中等学

校派教职员一人，前往学习，学员60余人，是为省办图书馆员训练班之始。

杜先生对于图书馆教育极为重视，认为要创办各类型图书馆，培训人才甚为重要，因此如有机会，他就愿意讲学。例如1924年夏，河南小学教员讲习会设小学图书馆管理法一科，他去担任讲师，为期三周，每日上课二时，并编发大纲，听讲学员达二百多人。又如1925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班、江苏教育会合组暑期学校，其中设图书馆组，先生教的科目有：图书馆学术辑要、图书馆行政、学校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图书流通法等。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先生任系主任，兼教授，讲图书馆学概论，并组织学生编制《1925年时报索引》，这是我国日报索引的先河。又如1943年先生在广东韶关主持广东省图书馆教育人员训练班，学期8周，学员30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春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六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在南京图书馆正式开学。学员主要来自省市以上公共图书馆的采编和书目参考部门的负责人或业务骨干，以及省辖市图书馆的领导干部，共计78人，为期65天，讲课的都是全国图书馆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先生讲授了《分类原理和分类问题》和《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对于各省馆组织地方文献专藏一节，影响很大。他在解放前多次想办一所图书馆学专校，培育人才，发展图书馆事业，都未成功。他屡次建设学校，当局都认为不是当务之急。这未免有负于他的愿望了。

※

※

1923年离开广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后并代理教育系主任，校长对先生颇为重视，担任各职，先生也以赤诚相助。1925年转任交通大学（即先生中学时代的南洋公学）图书馆馆长。因为这是他的母校图书馆，首先他捐赠了不少私自藏书，同时见到这图书馆虽自1918年创办，但多年来成绩欠佳，于是大为整顿，并订制了不少规章制度，然而有不少素来不守规则的教授反而感到不便而有怨言。

在1926年先生受中山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之职，后因与馆长李某意见不合，乃离职而再就上海交大图书馆馆长。记得本人在先生领导下，担任编目部主任，看到先生真是以馆为家，日夜操劳，西文图书已采用主题目录，师生称便。当时他曾主编了《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草案1896—1930》对于我国学术界参考价值很大。

1936年先生受中山大学之聘，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七七”事变后，战氛蔓延到广州，经常遭受空袭，风声鹤唳，不少师生员工和市民一样，疏散避难。“爱书如命”的先生，却要为了保护书刊资料，尽力率领馆内部分人员，抢时间装箱他运，以免损失。这就使日后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图书馆迁到粤北坪石时，全校师生进行教学具有必要的阅读参考材料，以供应用。他的不为己而为人“爱书如命”的精神，受到全校师生的好感尊敬。

先生不仅“爱书如命”，“爱校、爱国”也是一样。1938年的夏秋之交，抗日战争的局势紧张，菲律宾大学请他赴菲讲学。当时，广州正在疏散，如果他

从个人利益和安全出发，很可乘机一走了事，逍遥国外，但是他说：“眼见国家多事，如我只身逃避国外，苟存性命于乱世，而同胞在国内吃苦，于心何忍！我爱中大，我爱中国！”这种断然拒绝邀请，激励了人们抗战爱国之心。

先生在抗战八年之内，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中山大学的图书，由粤而桂，而滇而贵而湘，奔波几千里，最后在粤北坪石复校开馆。抗战胜利后，随中大迁回广州原址，对书刊资料的装运、接管、收集、整理等工作已应付不易；当时又兼省市两馆，百废待举，事倍忙，责倍重。但他毫不因体弱多病而稍懈。别人劫收，而他独为图书馆的馆舍和图书四处奔走，他要的是书，要的是图书馆地盘。这种为本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热忱从事，实在令人钦佩。

先生于1949年10月解放前夕，曾以不做官为理由，对有关当局命令他离开原岗位前往台湾，推辞不去，并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服务于省馆，书在那里，我个人就在那里。”当时，反动当局还准备了交通工具，要他把珍贵善本图书运走，他也拒绝了。后来，他们还威胁他说：“你只奉命疏散，谁叫你留守？你如果不走，非但不能保存图书，恐怕连你这条老命也不能保！”他坚决表示：“我与图书馆共存亡，个人生命已置之度外。”这不愧为“疾风和劲草”。当时先生的老母和妹妹，都在香港。为了他的安全，她们来信要他赴香港，一些馆员也劝他赴港暂避，自愿承担馆务，他都一一谢绝，断然表示“在最后关头作最后决定，我决不走！”他这种处置泰然，屹立不动，这是由于他饱历沧桑，厌恶旧社会的黑暗面目；满腔热情，寄托在快要来临的新社会。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国图书馆事业、先生本人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也迎来了新生。

※

※

先生在菲留学获得图书馆学学士的论文是《中国图书和图书馆》是以英文写的，书名是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由于此书内容是讲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的关系，势必要涉及“图书分类”的问题。他素来认为图书的分类当以内容为主，而不能因文种而区别，因此在1922年在广州讲学时，就提出这个论点，于1922年由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出版《世界图书分类法》初稿一书，到了1925年扩充这书的内容作为上海图书馆协会丛书之一，而由该会正式出版，改名《图书分类法》，1935年再加以扩充修订，又改名为《杜氏图书分类法》，其内容分为○种类，1哲学科学，2教育科学，3社会科学，4语言，5自然科学，6应用科学，7美术，8文学，9史地。这个体系虽然也受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的影响，但他想同时容纳中外图书，所以编制时对杜威《十进分类法》有不适之处就加以增删：例如把“宗教”并入“哲学科学”；“教育”自“社会科学”中升为一大类，这大概与他们受教育获得教育学士不无关系；把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的“4语文”和“7艺术”加以对调，这大概认为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的缘故；对于我国的古籍，尽量拆开分入有关各类，仅保留“经部”列入“总类”的第二目。从整体讲与当时的“仿杜”、“改杜”、“补杜”各种图书分类相较，似乎接近中国图书的实况，也能容纳外国图书。因此流传较广，可与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和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三者算是比较好的图书分类法。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三分法的学说，发表了《新图书分类法》，并改编为《广东人民图书馆分类法》这个分类体系，对以后各家图书分类法的影响颇大。如1956年他参加编制的《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草案》所采用的体系，就是一例。1962年前后，他看到世界若干新型的图书分类法问世，于是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科学分类与图书分类》、《图书分类法的路向》、《图书分类主词目录的建议》。文内指出我国新分类法的各种弊病，认为列举式分类法落后于时代，主张重起炉灶，编制一个新型图书分类法，要求把列举式分类法、分面组配化、分类主题一体化三者，熔于一炉。当时我国图书馆界对他的倡议没有足够的认识，多数人不赞同他的意见，有的更持否定的论调。针对讨论的不同意见，他又写了《新图书分类法的远景》一文作答。这场讨论对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未能起应有的作用，但他这种勇于进行新探索，善于借助外国先进经验和思想，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终于经过历史的检验，至今显出了他对我国图书分类法上所提倡的意义和价值。最近我们发现了他1962年编制的《图书资料分类法》一文，实际上就是他所倡议的一种体现。这篇文章已经我们整编，发表于《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四期。可供参考。

我们认为杜先生对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而关图书分类法，尤其是一个重点，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文章，值得重视进行研探。

※

※

杜先生的爱书爱国，还体现在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使用的实际工作中。他认为地方大型图书馆应该重视“地方文献”。一般认为“地方文献”的内容可以包括地方出版物、地方著者的作品和有关地方各方面的资料。他却认为当以最后一种为主，古籍中的方志，最为典型。只以收集南海诸岛史地资料为例，他是有莫大功绩的。抗战胜利后，我国政府收回西、南沙群岛，恢复主权。但接收后，法国人提出异议。当时他兼任广东省政府西、南沙群岛志编委，在获得的资料中，以意大利前驻粤领事罗斯（G·ROS）所藏资料尤为丰富；复得台湾省立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影赠资料一批，共计5百余件编成《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一册。根据中外文大量资料，证明南沙群岛主权在我，不容异议。为维护国家主权，他作出贡献。解放后这批资料及其“目录”，受到人民政府和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目前各级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积极收集、整理、使用，是与他的宣传、讲学分不开的。最近我国与西方友邦共同勘探西、南沙岛附近海中的石油资源，越南也提出主权问题，向我国抗议，早有成案可稽，实在是无理要求。再者，目前全国各省市县都在整理“地方文献”编撰各地“方志”，已经出版的新方志，最近在江苏出版总社主办的大型书展会上展出了。这一预见，实在可贵。

※

※

早在六十年前，为要改革《康熙字典》部首制的查字法，我国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汉字排检法。杜先生对此，具有深湛的研究。他于1925年发表《汉字排字法》，排检先以笔画多少为次，同笔画的以笔形为序，笔形计分18种，以点、横、直、撇为纲，这四种基本笔形，到目前为止，还在图书馆界广泛采用着的。但是先生后研究中国六书，认为汉字的排检当以形体为主，辅以结构的分析，

而后再论及其中的笔形，于是在1932年出版《汉字形位排检法》，开始分为“纵、横、斜、载、覆、角、方、整”八体，后来调整为“纵、横、斜、角、覆、载、方、整”的次序，成为四组的对立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五十年代初，先生曾在《中国语文》、1953年12期上发表《检字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一文，指出检字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对参考工具书如字典辞典、图书索引、资料收集、档案整理、人名录、电报码等一刻都不能没有。但当前的各种检字法，如部首制、笔画制、笔法制、四角号码制都不合理想，而且难于达到最大的功效，于是他提出了四大要求，那就是一要看得见，二要指得定，三要排得顺，四要检得出。到了1961年又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字改革》上一连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在《查字法问题的基本认识》一文中，首先提出汉字的组织形式，其次指出查字法的基本要求，第二点是发挥前文的论点，第一点却更为重要，实为查字法四种要求的本源。所以在这文的结论中曾说：“查字法一定要结合汉字历史发展的规律用文字固有的组织形式，阐明汉字序列的体系。汉字是祖国宝贵文化之一，我们必须予以慎重处理。中国查字法也有一定的条件，只能发扬和整理，而不能凭空“发明”的。必须从客观出发，确立群众观点，实事求是，在一定的方针路向底下，结合查字法在各方面应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字典辞典的编排和图书目录的序列，订出实际可行，为群众所能接受的方法。”

在《汉语拼音方案》发表以后，先生曾撰写《汉语拼音方案替图书馆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文，所谓三大问题，就是指图书分类号码问题，编制著者号码问题和汉字检字问题。由于在三个问题中都能达到了看得见、指得定、排得顺和检得到的四点要求，所以他非常拥护“汉字拼音方案”。从最近采用此法作为检字的工具来看，事实正是如此。他遗稿《愚者一得》一文（发表在《广东图书馆学刊》1981年第一期）中最后他说：“国内发表的检字法多至四、五百种，大都昙花一现，而余几十年来，考考屹屹，其愚不可及也。然愚者一得，亦期有贡于天下，但求检字法的理论基础。发扬光大，有待来者。”这种坚定不移的钻研精神，正与他曾说过的“学无止境，为学贵在创新”的精神一样，是值得后来的人发扬光大的。

※

※

早在1923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先生应邀出席。这次年会设图书馆组，可说是第一次全国性图书馆会议。在年会上他提出《推广全国图书馆计划》、《统一图书馆管理法》两个提案，又倡议图书馆统一分类编目。但当时不为人所理解，而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图书分编上，而且对图书馆的建筑、设备和用品上，先生也企图使之标准化，而便于工作。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周恩来同志那时在总理的岗位上，要求办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为之准备充足的物质基础，做到“军马未发，粮草先行”。可是当时在图书馆界人才缺乏，经济不足，尤其馆舍方面不敷应用，以致积压新旧的图书，比比皆是。如何解决这个馆荒问题，先生于1956年12月在南京图书馆第一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上发表《图书馆建筑面积的节约问题》一文，曾指出书库、书本、卡片，其它四方面，认为“图书馆建筑面积的节约问题牵涉到

多方面；书架的形式，排架的制度、藏书的组织，书本的改造，目录的编制以及阅览、出纳、保管的工作，必须从图书馆整个业务上各方面去考虑，进行科学方法研究。”当时，全国来宁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百余位同志，听了先生的这番研究成果，精密的计算公式，大家顿开茅塞，顿首称是。接着先生又与梁国权同志发表《临时书库设计（初稿）》一文于1957年4月《图书馆通讯》第1期上，这就引起了全国图书馆界的重视，从而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当时图书馆界这一个老大难问题。

先生不仅对图书馆建筑有研究，而且对图书馆的设备用品，也非常讲究。他不仅写了《图书馆表格用品说明》（1954年上海商务印刷所出版），而且创办了“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制作书架、目录柜、办公桌椅以及各式各样的卡片、簿册等等。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方便图书馆工作及推行图书馆用品标准化。然而当时这一创举，也不能为人所理解，被人诬为“营私舞弊”。以今天的要求一切的一切必须标准化来回顾过去，岂不是“冤哉枉也”？

当然，杜先生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真知灼见，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尽量地阐述，只好以待来日，再行补写了。

总之，杜先生对于图书馆的认识具有真知卓见，对于图书馆的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于图书馆的教育努力宣传而尽心传授，对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更有深入的探讨，因此他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多方面，数量可观，专著论文达二百件以上。然而他在博学多能的基础上，对图书馆分类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建筑、设备和用品方面尤为专约。他在老一辈的图书馆学专家学者阵营中，有一定的地位。今年正值他逝世廿周年，我敬以无限仰慕之情，略述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的生平事迹，以资永怀不忘焉！

学习《杜定友先生遗稿》的心得体会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王可权

《杜定友先生遗稿》经我的图书馆学启蒙老师、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钱亚新先生暨他的两位公子钱亮、钱唐同志的精心收集、整编、誊写成稿后，在我拜访钱师时，有机会，幸荣地成为这部遗稿的第一个读者，全文进行了学习通读。

回忆1956年，杜老来南京参加南京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经钱师介绍，这位我国图书馆界前辈，和霭可亲地会见了我这个刚从航空专业岗位上调来搞图书馆工作不足两年的新兵，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向我阐述了图书馆工作的意义，告诉我在图书馆工作中有深奥的学问，给我以工作动力，

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翌年，杜老二次来宁，为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讲学，因我在高校工作，未获信息，没能再见，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今天通读遗稿，似乎把我融化在他的文字中，随着他的文字的叙述，和他一起经历着他的各个生活历程，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有声有色，多层生动，又多层亲切，与自己三十多年建设高校图书馆的生活实践对比，给予我启迪与教育，铭刻在我的心坎。

通读结束，沉思终日，豁然开朗，拍案叫绝：杜老把自己与整个图书馆事业融化成一体，把理论与生活实践融化成一体进行叙述，使这部遗稿不仅是自传式的文献；而且是一部反映我国图书馆事业史近代、现代部分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的历史性文献；虽然论述的情节是二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后期的事，但由于我国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缓慢，许多事情至今何其相似，而杜老远见所及，提出的论点，在正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的今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它又是一部指导我们如何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的指导性文献。

这部遗稿，值得一切具有图书馆事业心的后继者过细阅读，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教益：

一、酷爱图书馆，把一切献给图书馆事业的精神：

我从事高校图书馆工作三十多年，也参加地区和高校系统的图书馆活动。既当过学生，学习图书馆学知识，也上过讲台，传播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接触过上千位的同行，他们是馆长、部主任、组长和具体工作人员，其中确实有不少同志热爱图书馆工作，诚诚恳恳，默默无闻，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做出了一定成绩，对图书馆事业有一定贡献，是我们事业的中坚。但阅读了这部遗稿，与杜老对比，似有差距。我们这些同志是具有较强烈的图书馆事业心，热爱图书馆工作，而杜老热爱图书馆，已把自己与图书馆事业融化成一体，他能抛弃一切名、利、地位甚至生命，却不能抛弃图书馆事业。例如：他在《我与南洋》一文中提到：“为馆服务，专心致志。家庭经济向由内人主持，我概不过问。终日埋手伏案，不理外务，绝少交游，君子之交，无所利用，即其他方面升以要职，或出较多工资，亦无不婉言谢绝，但愿终身为一馆服务，此外无他求也。”抗战八年，“余固守岗位，与中大图书生死相随。”与他在一馆工作，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离职他往时，按杜老条件，完全可另谋他途，但他却易地仍操图业。他热爱图书馆已使他与图书馆形影相连，不能片刻分离。他当馆长，一切业务工作必躬亲实践，如获心得体会，即著文以求发表，希望他馆也能分享其心得成果，他把一个馆的具体工作与整个图书馆事业联系在一起。从图书馆事业出发，他研究图书馆学的全部内容，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他最早发起组织广东省图书馆学研究会，成立上海图书馆协会，以至组织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他热爱图书馆，热爱图书馆事业，在遗稿的字里行间，表露无遗。他热爱到了沸点，升华成了“酷”爱。说实在的，我也热爱图书馆，但与之相比，差之千里，望尘莫及，无论如何达不到酷爱的程度。我们要建设好一个馆，要推动我们事业向前发展，多么需要成千上万位象杜老那样酷爱图书馆，具有把一切献给图书馆事业的精神的人啊！

二、学习杜老毫不保守，改革创新的思想观念：

现在我们正处在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这是形势发展对我们的要求。然而我们图书馆这个专业，受传统的“藏书楼”思想观念的束缚较严重。例如，在议论一个馆时，辄以藏书多寡，珍本、善本入藏情况，馆舍面积作为衡量标准。很少以读者范围、服务内容、书刊发挥的作用、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衡量。在管理方面，往往以藏书为中心开展工作，表现在“重藏轻用”、“重管理轻服务”，各自为政的建立“大而全”、“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闭性”的图书馆。在工作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计时效。对读者往往认为读者有求于我，而不是我应服务于读者。这一切都是传统的“藏书楼”的思想观念，必须破除，否则它阻碍着我们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影响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破除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才能建立起新的思想观念，以建设现代化图书馆。这些新的体现现代化图书馆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观念，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杜老身上已有所体现，通过他数十年百折不挠地身体力行和形势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是正确的，有无限生命力。

在他的遗稿中可以看到：他在办馆过程中，始终把满足读者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亦即是现代化图书馆的主要特征：“一切为读者”、“读者第一”的思想观念。他提出：“图书馆服务要旅馆化，对读者如对待亲人，要啥有啥，……布置要家庭化，力求舒适；设备要机械化、自动化。”他在计划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筑时提出：“希望读者一进图书馆门，就舍不得出去，内容应有尽有，服务力求周到，窗明几净，寒暑咸宜，有足以令人留恋之处。……我理想就是要使读者处处得到安适与方便。”他考虑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无论是书刊选购、分类法的制定、目录的组织、检字、废除著者号码改用拼号方法、提议采用颜色书标、提倡开架阅览和开架外借，并提出开架制度须区别对待，一律开架或一律闭架均不全面。凡此种种都是从读者需要和方便读者出发。他的“一切为读者”的思想观念指导着他的全部工作。

他的“藏书为了使用”的思想观念非常明确。他说：“藏而不用，何异藏石？现代博物馆尚且公开流通，何况是图书馆呢？”

他对图书馆的管理，非常严格，有板有眼，从不越雷池一步。他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别人这样做。然而他所制定的工作细则、规章制度的前提是从方便读者，发挥书刊作用出发。他重视管理，落脚点在于使用。

他主持一个馆，但考虑一切问题总是从整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他早在1922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分类法的要求，三十多年来始终为此而努力。同时还提出过统一分类编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统一分类法和统一集中分类编目与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的关系了。

关于藏书，杜老主张：“各大图书馆重点配备，各有特藏，互通有无。”这是资源共享建设现代化图书馆所需要的。

珍惜时间、爱惜生命，是杜老做事、做人的态度。他说：“生命是自己创造的，昼夜工作惟恐不及。”他每日黎明即起直至午夜，无片刻余，数十年如一

日。他在大学三年，修完四年课程，并加修学分，获文学士、教育学士和图书馆学学士三个学位。回国后，从事图书馆事业四十年，硕果累累。他对工作人员要求也颇严格，所领导的图书馆，则欣欣向荣，生气勃勃，工作井井有条，读者盈门，门庭若市。他看了不胜自喜，认为我们的事业发展了，服务的宗旨达到了，故终日劳累也甘心情愿，由此换来了他的容貌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看来至少相差十年。他自认为：比同龄人多活十年，因为几十年来，每天多做几小时工作。这种爱惜生命，珍惜时间，办事讲究时效的思想观念正是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的必备条件，也是一切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杜老留学菲律宾，攻读图书馆学，学成归国后，从事图书馆事业，以他在国外所学所见，对我国图书馆进行改革。在改革中，不论是采访、分类、编目、典藏、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的任何一个工作环境，都以方便读者和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认识拟定方案、细则，着手进行，决不生搬硬套全盘接受。因此，他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推动作用。这种改革精神和方法，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图书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杜老的“一切为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观念；“藏书为了使用”、“管理为了服务”的思想观念；从整个图书馆事业出发，推行统一分类法、集中统一编目，进行馆际协作、协调，建立网络化实现资源共享的思想观念；“珍惜时间讲究工作时效”的思想观念等等，正是我们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所必须确立的思想观念，没有这种新的思想观念，即使有全套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的图书馆，也无法建设开放型的现代化图书馆。

三、学习杜老耿直刚强，开拓前进的优良品格：

杜老自1921年回国参加图书馆工作至1949年全国解放的三十年间，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军阀割据，战祸连绵，八年抗战，颠沛流离，既无法安居，又不能乐业，文化教育业提不到议事日程，何况图书馆工作？在朝者，为国家民族分忧欲干一番事业者寡；官官相护，左右倾轧，年求私利升官发财者众。加以当时藏书楼思想根深蒂固。杜老以对事业的赤诚之心，进行图书馆改革，能不碰得焦头烂额？但他不计私利得失，无所顾忌，披荆斩棘，忍辱负重，不向左右低头折腰，耿直刚强，勇往直前，开拓前进。虽几经被逼离职，是易地而不更弦，所图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说：“成功不自我，鞠躬尽瘁，死而无憾。”

全国解放后至退休的十余年，是杜老从事图书馆事业较为顺利，心情比较舒畅的十余年。但总的看来，杜老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的一生，道路坎坷曲折，创业艰辛，尝尽了人间酸甜苦辣。然而他预见到事业发展的前途，满怀信心，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之奋斗终身。

四、学习杜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图书馆工作本身的要求。杜老在遗稿中提到：“我办学……考试要百分及格……”他说：“比如图书馆排列卡片100张，必须张张排队，才能及格。如果只排对了60张，那40张错乱的卡片，将给读者带来麻烦，对自己工作也增加困难。……考试形式应根本改造，保证学生毕业后能独立操作。”

“我主张依工序分段学习，学完一件再学一件，每段时间不必严格规定，学到人人都懂，件件都能为止。我还主张手脑并用，……一个人主持全馆工作，一切都得懂，都得亲自动手，力矫文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恶习。”他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也是这样要求他的工作人员的，同时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因此，一个管理混乱的馆，经他主持，不要很久时间，各项工作无不纳入正轨，做到流程畅通有条不紊。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也是每一个图书馆工作者所应该自我培育使之具备的。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杜老的一生，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他无媚颜屈膝的奴才相，有一副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利用空隙时间，运用图片资料，举办抗战图片展览；组织全馆人员，演唱抗战歌曲，公演抗战话剧，进行抗日宣传，推广社会教育，在这些活动中，杜老自任编导，参加演剧唱歌，展示了他的才和艺；在中国文学方面，他回国初期，虽被广东旧教育界遗老们控告为：“生长美洲，不谙中文”。然而他十五岁开始写作投稿，至六十二岁搁笔，留下文稿、专著、译著达600多万言，不谓不多矣。在这部遗稿中可以看到：他文笔流畅，比喻生动，他对事、对人、对物、对己，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幽默风趣，妙不待言，通读全文，是一种美的享受，岂是“不谙中文”？

总之，在杜老身上，可供学习的实在不少，我作为这部遗稿的第一个读者，把通读学习的收获归纳成文，供广大读者阅读时参考，我想也许是有益的吧？

一九八七年元月于南京

他有一颗晶莹闪亮的事业心

——写在杜定友先生逝世廿周年

中山图书馆 赵平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凌晨四时卅时分，杜定友先生因患急性淋巴白血症，经医治无效结束了七十个春秋的生涯，离开我们去了。今年三月十三日是他逝世整整廿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沉浸在深深的哀思中。

那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跟馆里的几位同志及杜先生在广州的女儿女婿，一起前往银河公墓给杜老扫墓。当我肃然站在他那富有学者风度的像前时，他那生前的音容笑貌和可亲可敬的身影，即刻浮现在我的面前，仿佛他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只不过多日不见罢了。然而，当我们悼念完毕，将他的骨灰匣放回原处时，我又感觉一片空虚缥缈，他离得我们竟是那么遥远。是啊，时光荏苒，不觉已过去廿年了。

廿年这个漫长的字眼，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地球不断地在转动，社会在继续向前发展，人们的生活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的生命永存，事业永存，人的意志永存。也意味着人死了不能复生矣。

杜先生他人虽去而志尚存，他那颗晶莹闪亮的事业心，永远光照着我们，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和行动的楷模。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对我说，在他没接触图书馆之前，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干起图书馆这一行。他原就读菲律宾大学，得的是文学、教育学和图书馆学三个学士学位。说也奇怪，他偏偏就选中了图书馆这一行。他不是不知道图书馆事业在中国从不被人重视，过去如此，今日亦然。那么他为什么又偏要干这一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所以他对此事业所采取的态度，是艺术家的态度。他曾比喻地说：“对于图书馆，正像一个画家对自己所画的图画一样，浸淫于艺术，而富贵则等于浮云。如果一个画家，在他开始作画之前，就想定这幅画可值多少钱，那结果一定画得不好。我办图书馆也是这样，倘我想藉此而攫取名利，也一定会失败的。”这充分说明杜先生之所以对图书馆事业始终锲而不舍，贡献终生，正是由于他树立了公私经纬分明的可贵的思想认识。众所周知，图书馆事业是个穷事业（人称“清水衙门”），可是杜先生则认为“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这铿锵之言，坚定的意志，实践于他那一生坚守岗位，淬励奋斗的实际行动之中，表现出一个事业家的执着地追求。这对一些干工作抱着有利就干，无利则走，学的是图书馆专业，仅为个人利益取就他途的人来说，该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杜先生常说：“一般不安于位，见异思迁的人，口头上说要作更大更好为人类谋幸福的事，而实际上是为个人打算，根本没有事业心的确立。”他还经常鼓励同志们要培养专业精神，并列举诸如：刘向父子校仇天禄；司马迁一世为史官；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克鲁普斯卡娅从事图书馆事业五十年如一日等等为例教育后学。他说：“他们并不都是傻瓜，但为什么一辈子干图书馆呢？是因为他们都看出了自己的工作是具有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只要我们坚守岗位，努力钻研业务，也会成为专家的，人民是会承认我们的。”

杜先生热爱图书馆事业，不仅表现在他不慕虚荣，孜孜不倦，艰苦创业，勤恳耕耘，而且真正做到了以馆为家，以业为生。他常对我说：“图书馆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图书馆，有家就有我，有我就有家。”他平时无论是谈学论道或发表演说，总是句句不离本行。与其将他比做传道的老“牧师”，倒不如说他是 个十足的图书馆卫道士更为贴切。他还风趣地对人说，他已和图书馆结了婚，而且婚姻美满，一辈子形影不离了。不是么？！我们仅以他多次受聘而不往，数次走难而不挫，护书如护命，爱馆不惜生，在国民党反动派威逼下，竟能表示出与图书共存亡的决心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境界，闻者自明矣。就是在他已退休养老的数年里，亦仍不辍笔耕，继续著书立说，直到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一生留给我们八十多种著述，五百九十六篇论文，六百多万字的遗产，实不愧为一代多产的图书馆学专家。

杜先生是广东人民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我的老领导。他那深厚的文化修

养，渊博的学识造诣，俭朴的生活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翻开我从事图书馆的日记，那第一页第一行便记载着我与杜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的一天，我拿着省人事局和省文化局的介绍信，到他的办公室报到，说明我被调来图书馆工作了。可我一进门便楞住了，这房间那像个办公室呀，简直就是卧室、客厅、书房兼饭堂的混合体。它布置简单，陈设简陋，除办公桌上书籍纸张、文房四宝井井有序外，整个小平房，残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相信这就是一馆之长办公、写作与居住的地方。然而事实确是如此，一个十分俭朴的人在我脑海里隐现着。

他伸手向我让了坐，他那清癯的面孔，半白的发须，文弱而微佝的身材，炯炯有神的双眼，看得出他文思敏捷，想像力丰富，一个极有风度的学者，一种莫名的奇怪感涌向我的脑海，图书馆也有这样的人物？

他简明扼要地向我介绍了馆情，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他试探式地问我：

“你为什么愿意来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有书，我喜欢看书。”我回答。

“不，你想错了，图书馆固然有书，但工作时间是不能看书的。”他注视着我。

“我是来搞人事工作的。”我不加思索坦然地回答。

“搞人事工作也得学业务，否则你怎能做好全馆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呢？”

“……”我无语。

几句看来极为平常的话，却表现出一个图书馆老园丁的深邃之见，它对我后来多年从事图书馆工作，逐步树立起事业心来，影响至深。使我不仅在做干部工作或是做行政工作，都十分注意了学习业务、增加专业知识。一九六一年我还考取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第一期函授班，三年学完大专毕业，从此使我对图书馆专业知识，有了较系统的掌握。

杜先生在五十年代还经常对我们说：“我从事图书馆事业几十年，献出了青春，但过去解放前那一段走的黑暗的路，冤枉的路。如今好了，现在你们走的是康庄大道，你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为祖国，为图书馆事业也献出你们的宝贵青春吧。”杜先生对共产党如此信赖，表明了他饱经风霜的肺腑之言是发自内心的。是的，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是一栋栋具有现代规模的图书馆出现在全国各地，今天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中山图书馆已初具现代规模的情景，杜先生未能身经目睹，而遗憾地溘然辞世，吾辈不能不为之惋惜也。

今天我和同志们一起，怀着崇敬的心，缅怀他，纪念他，正是为了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学习他对党的信赖。特别是也要像他那样树立起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生的事业心，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出我们美好的青春，以告慰含笑九泉的杜定友先生。

事业是世代相承的

——代序

赵世良

一九八七年是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将出版社老的遗稿选集。钱亚新先生提出要我为该书作序，这原是我所不敢的，因为深知自己并不具备做这件事的能力和条件。但是力辞不获，只得商量说：写点文字回忆行不行？想不到南京的朋友们竟同意了，于是只得写起来。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杜先生为图书馆事业奋斗了近半个世纪，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余生也晚，当我以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投身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五〇年了。作为一名后学，把我受自杜老的教益记录下来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正是对杜老影响所及的一种真实反映。只是这种文章能不能算是序，却实在说不准，故题曰代序。

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当了两年半的图书馆管理员，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始。面对着几十名教员、一千多学生，我们三名管理员共有五间大厅、两万多书，要我负责。书需要重新整理，一切规章制度也都有待建立。那时虽然根本不了解这件事的复杂性，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做，但我心里却毫无惧意。当看到许多书都有丛书名时，我忽发奇想：就把他们都按丛书组织起来吧！说干就干，一下子先把两三千册书下了架，就按这办法“弄起来。走不通是当然的，于是我百分之百地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一急之下，还真地流下了不少眼泪，但也开始知道了这事需要学习。

找来了一本“万有文库”版的王云五分类法，翻开看看，依然是莫测高深。这时有人介绍我去找当时北京市图书馆的采编部主任卢景云同志学习，卢先生是很肯帮助年青人的，娓娓谈来，问一答十。但在我的头脑里却无论如何也形不成一套系统的概念，已知者似乎件件非常重要，而未知者却又不知还有多少，因此仍然是拿不出一个整主意来。

就在这时，一本《新图手册》出现在我的面前；从此我认识了“图”这个字，也知道了有那么一位杜定友先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拿起这本书来，恍如故友重逢，而对它的简要、具体并且又非常实用这一特点，但仍觉惊异不置。想不起还有哪本书能给实际工作者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这种想法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偏爱，那就只有请别人来评论了。

这本新书真的成了我的“手册”，不，不是手册，而是一本枕边书。有功夫就打开看，看懂了自然高兴，看不懂就翻过去看下面能懂的。看的遍数多了，懂得的自然愈来愈多。而最主要的是我有了总的想法，似乎知道了应该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范围，对未知的东西也知道如何去寻求了，于是真的有了主心骨。这没有主心骨可大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新图手册》就是我一辈子图书馆员生涯